

上卷 (I)

中国 经济学 风云史

经济研究所 60 年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张曙光 著

上卷 (I)

中国 经济学 风云史

经济研究所 60 年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张曙光 著 ■

上卷(1)

中国 经济学 风云史

经济研究所 60 年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八方文化创作室

作 者	张曙光
责任编辑	何华
封面设计	张伶
内页设计/排版	李丽芳
出 版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联 络	65-6466 5775 chpub@wspc.com
印 刷	Mainland Press Pte Ltd
初 版	2016年10月
国际书号	978-981-3145-25-2 (pbk)
定 价	S\$26
版权所有	©2016/八方文化创作室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谢~

本项研究的完成得到了很多前辈、同仁、后学的指导和帮助，是值得首先记述和感谢的。

由于接触时间早晚和所起作用的不同，我想分为几类来记述。

在动手以前，笔者曾经请教过经君健、周叔莲、卢跃刚、李实、岳希明等人，同他们讨论本项研究要不要做？能不能做？以及如何做？他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意见。特别是关于所史的体例、写法，以及篇章设计，经君健和卢跃刚都给出了很多建议。

访谈是了解情况，获得信息，掌握史料和证据的重要途径，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请教的机会。有人访谈过3、4次，有的面对面交谈，有的电话交谈，还有的是用电子邮件交谈。访谈的人有：经君健（三次）、汪敬虞、贾梅芳、聂宝璋、汪德余、万典武、杨仲玉、朱家桢、乌家培（二次）、章良犹、魏金玉（二次）、杨春学、张卓元（二次）、宓汝成、胡代光、裴俊生（二次）、林青松（二次）、孙世铮（二次）、唐丰义（二次）、戴园晨、江明、马家驹（二次）、田江海、徐秉文（杭州）、项启源、赵人伟（四次）、唐宗昆（三次）、罗小朋（威海）、方留碧、田夫、黄范章、丁盘石、李伶人、张学军、华生、石小敏、杨世英、朱厚泽、刘国光（二次）、李泽中、李茂生、朱荫贵（上海）、高建国（二次、上海）、陈家华（上海）、陈瑞铭、赵效民、江东、李成勋、吴承明、周叔莲（二次）、沈立人（南京）、李德华（武汉）、沙吉才、任维忠、余大章（三次）、杨长福、贺菊煌、朱绍文、杜培荣、罗银胜（三次、上海）、李玉（上海）、黄少卿（上海）、林缨初（上海）、杨圣明（二次）、张五常（三次、深圳）、吴家骏、郑洪庆、吴敬琏、薛小和（二次）、周明俊、张天心、袁钢明、高梁、毛

振华、李昭、周瑞金（上海、二次）、李实、高尚全（二次）、杨启先、刘家声（兰州）、薛永应、李振宁、冯兰瑞、厉以宁、刘吉（上海）、余品根（现在上海）、徐滇庆、林毅夫、陈必生（重庆）、汪海波、刘树成、马险峰、杨仲伟、林凌（成都）、王洛林、徐景安、干学平（台湾）、林保华（台湾）、文贯中、李伯溪、吴明瑜、刘鸿儒、徐方、陶永谊、樊纲、张维迎（二次）、廖元和（重庆）、林大建、何方、陈玉光、沈昌文、杨冠三、鲁利玲、江春泽、朱恒鹏、郑红亮、吴太昌、刘吉瑞、李剑阁、叶辅靖、黄馨瑶、田雪原。

给我提供资料和证据的有：周叔莲、章良犹、任维忠、柳红、裴俊生、陈瑞铭、万典武、汪敬虞、聂宝璋、唐丰义、黄范章、吴家骏、乌家培、经君健、鲁利玲、华生、张维迎、徐景安、高尚全、张旭昆、丁宁宁、范世涛、干学平（台湾）、黄春兴（台湾）、瞿宛文（台湾）、巫和懋、李罗力（唐惠建、郑俊璇，深圳）、迟福林（海南）、张军扩、卢锋、吴敬琏、田岛俊雄（日本）、张五常、厉以宁、盛洪、程炼、王海明、杨继绳、毛振华、何方、陈玉光、李晓西、魏加宁、柳红、汪熙增、余永定、吴惠林（台湾）、胡冀燕、冒天启、江春泽、罗银胜、黄馨瑶、马大成（杭州）、陈平（香港）、田雪原。特别是鲁利玲，不仅给我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而且帮我找有关人士澄清了一些重要问题。

帮助我查找资料、购书、复印资料的有王燕坊、刘凤英、向彪、张良、李婧、杨小静、江海波（广州）、钟振图（广州）、温秋根（广州）。特别是王燕坊和向彪不仅帮助我查找、购买和复印了大量资料，而且帮助我拍照和安排了一些访谈事宜。

经济所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档案局领导允许我查阅了所内文书档案和院内通信、科研简报、《要报》等资料。

唐寿宁、马俊、高国杰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提供资助。

赵人伟、唐宗焜、卢跃刚、经君健、李实、刘守英、管毅平、余大章、余永定、高岩、周叔莲、吴思、宋小梧、吴敬琏等审读了本书部分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对以上人士和机构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里包含着他们的心血和期待。当然，错误完全由本人负责。

最后要感谢我的夫人张霜女士，她虽然不赞同我做此项研究，但却承担起全部家务，并帮我做了大量秘书工作。

~ 自序 ~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是一本史书，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历史记述和评说。因此，在这个序文中，我要就做本项研究的一些想法，对读者做出说明和交待。

1. 缘起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笔者读过一些历史著作，但著史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过，做做与经济学有关的历史研究，也不算离题太远。更何况，笔者在经济所生活和工作了50年，很多事情也是亲身亲历，做起来，不会感到陌生，也不会有隔靴搔痒之感，而是感到亲切、自然。会不会发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的现象？笔者不敢断言，还要请读者评判和鉴别。

对于笔者来说，做经济研究所的历史研究，并非心血来潮。记得，早在90年代末，我就提出过这一题目，并且在闲聊中鼓动一些人去做。然而，始终没有人接招。

其所以提出这一研究课题，是鉴于经济所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丰富的活动内容。经济所曾经是中国最高的经济研究机构，而且在长时期内处于独家垄断的地位，其他的经济理论研究机构几乎没有，专业部门和地方的经济研究机构也无法与经济所相比；大专院校经济院系的老师数量不少，但都有教学任务，也没有经济所那样能够广泛地接触实际经济生活。经济所的活动不仅紧紧围绕着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斗争，直接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脉搏一起跳动，而且很多研究成果都可以通天，成为国内政治经济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所人才济济，集中了国内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者，在各自的领域往往是独领风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

的一个长时期内，经济所的地位和状况使它在解放思想和推动改革中，起了突击队的先锋作用，也为其他单位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领导和骨干人才。这种情况也许持续到上个世纪末，直到体制内外的其他研究机构成长起来以后。因此，经济所曾被看作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家队”，是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摇篮和发展的基地。或许，从一个侧面来看，一部经济所的所史，既浓缩了近五、六十年中国经济学的成长史和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近几十年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我想，读了本书，读者也许会感到，此说大概不虚。

与其说服和动员别人做，不如自己去做。于是70岁生日过后，我决定动手做这件事情。因为，从1959年考上大学，我就开始了经济学的学习，到2009年已经整整50年；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开始，已经整整30年。可以说，我的一生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写了几篇经济学文章，出了几本经济理论著作，是文革前国内大学毕业的学者中能够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从事理论研究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但是，终究由于自己原来受的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训练，现代经济学是干中学的结果，因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理论创造，只是没有太落伍而已。既然做了几十年的经济学研究，可以换换口味，做做其他的研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加上一些同事知道我有此想法以后，积极鼓励和支持。于是做了一个3-5年的计划，开始了这项浩大的工程。

需要说明的是，这样安排并不是对经济学研究感到厌倦。事实上，我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一直未减，现在除了每个季度做一篇宏观经济分析研究报告以外，还在经常思考一些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也许在过了70岁的人中，能够这样做的人很少。只是主要力量不放在这里，而且做经济学研究的方式也有了一些变化。我把自己思考的一些问题和想法提出来，与青年学者一起讨论，合作研究。近几年发表的一些理论文章，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做经济所所史研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比做一般的经济学研究可能更复杂，更困难。原因在于，出于政治的考量和利益的权衡，现在，歪曲历史和编造历史也许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为尊者讳也成为一种社会积习，不论是官方修的史书，还是私人写的传记和回忆录之类，不是假大空，就是高大全，平实无华、令人信服者的确是凤毛麟角。因此，要做一部经济所的信史，很可能是不合潮流，乃至不识时务者之所

为。然而，笔者下定决心，就是要做一部真实的历史。如果随意编造，宁可不做。

既然要做信史，就要如实记述，是就是，非就非，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真人、真事、真心。这样就会涉及到很多具体人和具体事，特别是那些名人大家、高官政要的不大光彩的事情，必然要得罪人，也可能会惹来麻烦。我想，还是那句老话：吾爱吾师（友），吾更爱真理。还可再加上一句：尊重他人人格，并不需要隐恶扬善，也不一定非要替尊者讳。夫人出于好意，反对我从事这项研究。也有同事不赞成我做这件事情，劝导我：你做你的经济学研究，何苦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和担忧。心想，只要工作做得扎实，经得起检验，就不怕有人挑刺找岔。如果真的找出错误，我还得感谢他。同时，我过去写过很多学术性书评，批评过不少人，有的惹来麻烦，有的引起争议，有的成了朋友。也许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能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好在，大部分人持支持态度，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因为，历史是有生命的，是可以延续和留存的¹。这也增加了我做好本项研究的信心。

还有一种担心，在目前国内的体制和舆论控制下，做此事不可能放开手脚，原原本本，如实描述，否则，会有人干预；即使无人干预，也无法出版。其实也未必。为了避免干扰，我将此完全变成一件私人的事情，不与任何单位发生关系，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研究所。一些机构知道我从事这项工作，提出给我资助，我也暂时谢绝，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葛。我不仅要如实地写，而且怎么看，就怎么写，怎么评论。至于能否出版，这是后话。国内能出则好，国内出不了，先拿到境外去出。现在，在境外出书也不是个别的事情。境内可以管制，境外则管制不了。

对我来说，做这件工作，既不是任务，也不是负担。我是把它作为一件好玩的东西来把玩的。以此来消磨时间，打发日子，充实生活，只

¹ 钱穆说，“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彻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一定会‘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将来’”，“历史是一种‘把握我们生命的学问’，是‘认识我们生命的学问’”，“‘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工夫”，“凡属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必然有两种特征：一是变化，一是持续”。引自《中国历史精神》，第5-12页，九州出版社，2011。

要享受了过程，结果就是无所谓的。有时外出访谈和调查也确实辛苦，但苦中有乐。搞清楚了一件史实，就是最大的慰藉。

2. 做法

为了做好本项研究，在动手以前，我曾经向很多人请教，既有经济史研究的专家，也有做其他研究的学者，得到了他们多方面的指点和帮助。我的工作也基本上是按照前人的经验和自己的思考进行的。

整个研究工作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进行访谈，二是阅读有关著作，三是查阅有关历史和档案资料。现将有关情况分述如下。

2.1 关于访谈

进行访谈，做口述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访谈的作用主要有三个，一是寻找线索，二是搜集证据，三是核对事实。古语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访谈中，必然会提到很多人和很多事，如果事情很重要，就需要进一步了解，提到的人也许就是进一步访谈的对象，我对很多事件的追溯就是这样进行的。特别是一些重大的事件，涉及的人可能很多，如果能够找到所有有关的人员进行访谈当然更好。不能找到所有的人，至少要找到处于不同地位和持有不同看法的人，特别是处于对立双方的人进行访谈。因为，过去几十年内，在阶级斗争方针的指导下，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很激烈，也很残酷，所以存在不同意见和看法是很正常的。有些人听到一边或一派的说法就写，结果没有不出错的。即使同一观点的人，由于所处地位和观察角度的不同，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说法，都需要听取和了解。其实，不同的说法相当重要，它提供了探明真相的激励和线索，顺着这些线索追本溯源，就可以逐步接近和再现事情的真相。比如，为了了解在经济所广泛流传的在干校打顾准的真相，我查阅了有可能记述这一问题的相关文献，几乎找遍了当时干校二排的人进行访谈。再如，为了弄清楚《改革》杂志转载皇甫平文章的真相，我在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地找过多个当事人和知情人访谈。

要知道，人的记忆是有差错和误区的。找不同的人进行访谈，可以相互印证，纠正差错，减少误断。为了避免记忆的差错，对访谈中提

及的重要问题，要注意搜集证据。特别是对于有分歧的说法，更要重证据。没有证据，不要轻易采信。证据也有真伪，需要认真鉴别。搜集证据并非易事，往往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鉴别真伪，则需花更大的工夫。

到现在为止，一些简单的交谈和电话不算，我已经访谈过120多人，有的人访谈过二、三次，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和材料。所有访谈除两个人非要来找我外，其他都是我登门拜访。只要约定，不管刮风下雨，不管酷暑烈日，也不管是严冬大雪，我都前去访谈。在开始访谈时，由于有人有顾虑，我拿着录音机而没有录音，自己做记录，每次访谈结束回到家中，我会立即进行整理，并录入计算机。值得庆幸的是，我访谈过的人中，由于年迈或者疾病，在我访谈过后不久，有人就驾鹤西去，但却留下了宝贵的信息，如杨世英、吴承明、朱厚泽等。

尽管我已经访谈了100多人，但仍有遗憾。一是我动手晚了，不少重要人物已经过世，如孙冶方、孙尚清、董辅弼、巫宝三、严中等。有的虽然健在，或失去记忆，或不能讲话，或老年痴呆，已经无法访谈，如于光远，我最先找他，家人告诉我他已无法交谈，我仍将信将疑，后来到医院看他，他已经不认识我了。二是一些重要人物拒绝接受访谈，如郑必坚、于祖尧等，我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态，尊重他们的选择，不接受访谈，是他的自由，他有保留秘密的权利，至于各人拒绝的具体考虑，我当然不得而知。还有人也不愿接受我的正式访谈，但从交往中仍然提供了不少信息。

2.2 关于阅读著作

做经济思想史研究，自然要了解作为思想史载体的经济学著作，因此，大量收集和阅读相关著作是本项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到目前为止，我收集和阅读的著作有400多种500多本，此外还有大量的报刊文章。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所内外相关人士的个人文集，如《孙冶方全集》（6卷）、《刘国光文集》（10卷）、《马洪文集》（12卷）、《顾准文存》（4集）、《吴敬琏文集》（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所学者的个人文集（共17种；如《许涤新集》、《朱绍文集》）、于光远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探索》（7集）、《乌家培文库》（10册）、《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蒋硕杰先生学术论文集》和《蒋硕杰先生建言录》，以及张闻天、杨坚白、董辅初、赵人伟、张卓元、周叔莲、厉以宁、卓炯、李锐等人的文集或者自选集。

二是国内外各种有关的著作和专著。如，《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中国经济体制模式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再研究》《研究iii》、《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革研究》、《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短缺经济学》等。

三是各种重要的官方文件和官员著作。诸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朱镕基讲话实录》、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共12册）等。

四是各种人物传记和回忆录。诸如《毛泽东传》、《张闻天传》、《孙冶方传》、《顾准传》（2种）、《董辅初传》（2种）、《中国经济学家列传——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刘国光》、《吴敬琏传》（3种）、《薛暮桥回忆录》、《胡乔木——中共中央第一支笔》、《十二个春秋》、《别有人间行路难》等。

五是各种讨论会的文集和资料选汇。如《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1959年4月讨论会论文汇编》、第二次全国经济讨论会论文（4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等。

六是各种报刊文章和网上资料。

对以上著作都进行翻阅，重要的和引用的都要认真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比较、核对，既发现了很多重要问题，也发现很多重要错误。

2.3 关于查阅档案资料

由我打报告，经所领导讨论报院档案局批准，我查阅了经济所的文书档案。对一些问题得到了确证。最后编制的附录：经济所领导和机构以及人员的变化，不少资料也来自文书档案。

在查阅所内文书档案以后，我又打报告给所领导并院档案局，要求查阅院内文书档案。经过批准，我查阅了1977—2005年的院内《通讯》、《科研简报》和《要报》。

为了查明事实，我也找到了一些内部资料，如《孙冶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论摘编》、《对孙冶方同志主要错误的批判》（发言汇编）等。

3. 写法

关于本书的写法，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写什么不写什么，即研究写作的对象范围和主要内容；二是怎么写。

3.1 关于写什么不写什么

这里有几个重要关系需要恰当处理。

一是关于学术研究与政治运动。经济所是一个学术单位，其历史也应应以学术思想的变迁为主。然而，在过去的50—60年中，国内的政治运动不断，经济所也是既从事了大量的经济研究活动，也参与了历次政治运动。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政治运动写不写？经过一番交流和思考，我的选择是这样的：凡是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活动、重大事件、关键人物、主要成果，都是重点研究和写作的对象和内容。如果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与政治活动有关，或者变成一个政治事件，也就要描述相应的政治事件，否则，学术活动也无法说明，特别是在过去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如，为了说明《食堂报告》的研究写作和命运遭遇，我们详细记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公共食堂从兴起到解散的全过程。再如，1964年对孙冶方学术思想进行的政治批判，与当时国际国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我们不仅记述了经济所“社教”的全过程，而且描述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所谓反修斗争。一般的学术活动也要关注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背景，以便对其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几乎每一章都有这样的描述。至于单纯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事件，我们并不过多涉及，只是描述它对学术研究活动的影响。如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们只是在一节中简述了它的经过，主要是揭露了它对思想理论的压迫和学术研究环境

的破坏，同时记述了孙冶方、顾准、严中平等一些学者坚持继续进行研究的情况。

二是关于经济所和经济学界。经济所虽然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研究机构，经济所的学术活动也是经济学界的重要活动，但经济所毕竟只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部分。这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对经济学界的活动如何处理。在本项研究中，我们确定了一个原则，凡与经济所有关的，要写；凡与经济所无关的，不写。如果与经济所有关的不写，那么，经济所史也就会残缺不全；如果与经济所无关的也写，那就显得庞杂，也就不是经济所史了。如，1985/86年的马丁文章事件，因与秦柳方小报告事件及其对经济所的影响密切相关，是反精神污染中两大典型事件，因而也详细加以描述。不仅如此，为了记述这两大事件，我们也描述了反精神污染的提出和推行及其后果。

三是关于人和事。凡发生在经济所的重要事件，我们都加以记述，这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由于人是活动的，有的人原先在经济所，后来调到其他单位，有的人原在其他单位，后来调到经济所，这些都在我们的研究对象和记述范围之内。如果此人为重要人物，在人物思想卷中，我们会全面加以描述。如果不是这样，很多事情就不会是完整的。

3.2 关于怎么写

为了提供一部真实的历史，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们没有采取夹叙夹议的写法，而是把述和评严格分开，先记述一个事件的发生背景、来龙去脉、人物活动和发展过程，然后再进行评论。在记述事件过程时，只在一段的开头或者结尾，有一些概括性的导语和画龙点睛式的评论。而笔者对事件的看法，均在每章、每节和每个问题的后面专门表述。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故事可以比较完整，二是评论可以充分展开，三是不会造成史实与评说的混淆。

由于历史都是关于过去的事情，所谓历史的真实，也即史料真实。而有些史料则有不同的说法，特别是一些口述历史，对同一件事情的观点，不同人所持角度不同，观察的侧面也不一样，虽然不是瞎子摸象，却也说法炯异。经过一番追索和查证，有些问题能够弄清楚，能够做出判断，可以秉笔直书；有些则弄不完全清楚或者弄不清楚。遇到这

种情况，我们将把各种不同的说法都写出来，不作结论，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是一种客观的态度，也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从1963年9月开始，笔者一直在经济所生活和工作，经济所发生的不少事件和活动，我也参与了。凡涉及到这些事情的地方，笔者都把自己放进去，特别是对自己的一些错误行为和错误思想，我也如实地向读者做出交待。

在研究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现有文献和记述中有很多错误。为了写出一部真实的史书，不论是谁的错误，也不论它会涉及到谁，我们都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并对一些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4. 结构

按照内容，本书设计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事件变迁”，下卷为“人物思想”，分别从不同方面再现经济所60年的风雨历程。

所谓事件就是具有社会重要性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历史就是由一个个事件及其变迁构成的。在上卷中，事件变迁基本上按照发生时间的顺序展开，但相互之间也有交叉，包括重大事件和集体研究活动。除第1章绪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百年变迁外，大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8-1978年的30年，共有6章，除记述两岸分设、北迁更名和范式转换以及科学进军和反右派斗争外，重点是1958年孙冶方当所长以后的活动，包括昌黎调查和《食堂报告》、重启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和第一次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讨论会、《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和60年代中期对孙冶方的批判。

第二个阶段是1978到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共14章，是上卷的重点部分。内容包括两次理论大论战，东西两个方向的开放潮，两个重要会议和翻两番，青年人的成长和老专家的业绩，改革方案设计和价格闯关，反精神污染和“六四”事件前后，财政改革争论和股市大辩论等。这一阶段以“六四”事件前后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包括8章，全部描述1978-1988年发生的事情；后一部分设有6章，主要记述1989年及其以后发生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全程性的，包括两章，分别记述经济研究机构的多元化和经济所的衰落，以及台海两岸经济研究的交流和比较。

下卷《人物思想》，描述经济所的15位重要学者的生平和思想。入选的标准设定为：一是学术贡献，而非官位和资历，二是有代表性，能够代表经济所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三是均为笔者的前辈，即年龄均在75岁以上。分作大传、中传和小传，大传记述顾准和孙冶方2人；中传描写董辅弼、刘国光、吴敬琏、吴承明、张闻天等5人；小传叙述严中平、巫宝三、朱绍文、杨坚白、孙尚清、乌家培、赵人伟、张卓元等8人。

对人物思想的讨论，我们想打破现有的陋习，既讲他们的理论贡献，也写他们的思想局限；既讲他们的成功之道，也讲他们的失足之处；既讲过五关斩六将的丰功伟绩，也讲走麦城的不幸遭遇，而不是一味地评功摆好，树碑立传。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试图探寻和分析他们为什么能够达到如此高度，或者为什么会发生失误，从而描绘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和思想过程。因此，在我的笔下，既没有伟、光、正式的人物，也没有高、大、全式的角色。

5. 历史观

本项研究在酝酿的过程中，笔者曾经向一些学生谈起自己的设想，其中，我的一个学生（已取得博士学位）不大赞同我做这项研究。他提出的理由是，做这项研究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否则，不仅做不好，还会惹来不少麻烦。因此，我想借此谈谈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至于这些看法能不能构成历史观，笔者没有深究；即使所论是历史观的问题，那么正确与否，笔者更不敢保证。也许各人有各人的历史观，无所谓正误。其所以想讨论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是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碰到和思考过的问题，并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自认为这些看法还有某些道理，有的是大家忽视了，有的也与目前的主流话语不大一样。

5.1 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理念是，“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为此，我们高举“造反有理”，大力讴歌农民起

义，并以此来批判英雄史观。其实，这是一种简单化、片面化，甚至是有意歪曲了的历史观。

历史既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也是英雄创造的，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的。首先，英雄是人民中的一分子，是在群众中涌现出来和由群众推举出来的；离开了人民群众，不过是光杆司令，也就无所谓英雄。其次，英雄是群众的头，群龙无首，那是乌合之众，不仅成不了气候，而且会造成破坏。再次，英雄既要有英雄气概，又要有进步的理念，还要有审时度势和与人合作共事的能力。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领导者的理念、决策和表演的确可以转动历史车轮，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随使孺子成为英雄。因此，英雄创造历史和人民创造历史并不是根本矛盾和完全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在我们的理论和现实中，我们一方面批判英雄史观，大肆张扬“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另一方面，我们却到处宣示“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这不仅说明这种理论本身就是矛盾的，而且也说明，在这种理论中，人民群众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跑龙套的角色。事实上，解放以来的历次群众运动，群众从来都是被蒙蔽、受欺骗、被裹胁的，都不过是运动群众而已，实际上是一种独裁者的面纱和多数人的暴政，而我们却要把它说成是群众的创造。实际上，这是假人民当家作主之名，行集权专制之实，大规模地造神和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之说相去甚远。

事实证明，在这种假人民群众之名，行英雄崇拜之实的历史观的指导下所创造的历史，往往是历史的曲折和弯路，是“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

其实，历史也有多种，有大历史，也有小历史；有整体的历史，也有无数的个别历史；有通史、断代史，也有各种专史和他者的口述历史。正如法国年鉴学派史学所要求的那样，“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王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描述性的历史；是有分析、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

是一种总体的历史”²。大历史、通史、断代史之类，少不了帝王将相、领袖统帅，有英雄可写；而小历史，特别是一些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从田野调查中书写的历史，就没有英雄可写，也不是现在语境中所说的人民创造历史，虽然有着大历史的背景，但记述的是某个地域中发生的某一段变迁，某个社会中某些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等。这也是历史，而且是很真实的历史，是与现有一般历史不同的历史。这既是对英雄史观的直接否定，也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所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5.2 关于“成王败寇”之说

在中国人的历史观念中，有所谓“成王败寇”之说。所以，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特别是官方修的正史，都是胜利者的历史，也是胜利者写的历史。为了粉饰，为了歌功颂德，为了寻求继续统治的合法性，往往会歪曲事实、阉割历史，尽量往胜利者脸上贴金，给失败者身体抹屎。也许只有一部分野史，有对胜利者的揭露和批判，对失败者的赞扬和歌颂。其实，胜利者和失败者是一对怨家，谁也离不开谁，各有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胜利者并非那么光荣、伟大、正确，更非道德楷模、万世师表和超人圣贤，失败者也不都那么卑劣、渺小、错误，也有很多光明磊落、德才兼优之士，敢做敢为、虽败犹荣之人。且胜败乃兵家常事，也是历史的构成要件。胜利者既有伟大和正确之处，也少不了运气和机遇，更兼有大量的阴谋、暗算；失败者并非无能之辈，只是有些背运和倒霉，在权谋方面比胜利者略逊一筹，也许还有些天真无邪，错把砒霜当蜂蜜。总之，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是人，只是历史的机遇把他们推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穿着不同的服饰，拿着不同的道具，装扮成不同的人物角色，尽情地表演了一番。表演好坏都是客观存在，都是历史。

历史不是线性的，也不是简单直白的，而是复杂的，有曲折、有反复，切莫简单视之。写历史，记述胜利者的伟大、正确不难，难的是真正写出他们的错误和局限，并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陈述失败者的缺失和错误也比较容易，关键是能否真正写出他们如何铸就了败局，并对

² 勒高夫（Legof）等主编：《新史学》，姚蒙译，第1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